

关于中国民族資本的原始 积累問題

从 翰 香

(一)

关于資本的原始积累問題，国内外史学界都在討論，这个問題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和近几年来資產階級历史学特別重視这个問題相联系的。資產階級辯護士們，在宣揚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具有所謂“人民性”的同时，还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描繪成“和平的”、“演进的”过程。說什么資產階級乃是“勤劳节儉”起家的，借以欺騙和麻痹人民。因此，研究資本的原始积累，揭露資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东西，即使在現在，也依然是必要的。

同时，大家之所以十分注意这个問題，还因为資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本身，尙有許多疑問等待回答。

馬克思对英国資本原始积累的精辟分析和深刻揭露，为我們提供了一幅原始积累的生动画面。馬克思又告訴我們說：“这种剝夺历史，在不同的国度，着上了不同的色彩。”^①这就是說，要对各国資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具体的研究。

資本原始积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問題，須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只就中国民族資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作一些初步探索。

什么是資本的原始积累？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其产生必須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要有大批无产者可供資本家雇佣；另一方面要积累起建立資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貨幣财富。这些条件的形成过程，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先行阶段，馬克思将这个阶段称作为“資本原始积累”。馬克思說，这个阶段之所以“表现为‘原始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5頁。

的’，不过因为它是資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的史前时期”^①。它“不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結果，但是它（資本主义）的出发点”^②。

同时，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形成，乃是小生产者的生产資料橫遭剝夺的結果，所以馬克思又說資本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資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③。然而，馬克思并不是說，生产者与生产資料的任何分离，都构成原始积累。就我国來說，远早于鴉片战争前，地主、官僚、商人与高利貸者对广大农民的剝削，就已在不断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資料相分离了。他們握有的巨額財富，但是，除了用来滿足奢侈的寄生生活以外，其余的，主要都投入了土地，其次則用来进行商业投机或高利盘剝。所以，財富的积累主要表现为土地集中。而那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从生产資料中游离了出来，却并没有成为資本統治之下的劳动力出卖者。絕大多数人都淪为貧农、佃农和雇农了。这些劳动者和土地的結合，显然不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結合，而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結合形式。

馬克思早已明确地指出过：原始积累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資料及生产資料轉化为資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轉化为工資劳动者”^④。由此可见，原始积累的基本內容，在于积累起来的財富是否轉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垫支資本，如果没有完成这种轉化，尽管积累得如何之多，也不可能构成原始資本的来源。

但是，在关于中国民族資本原始积累問題的討論中，有些人正是忽視了这个問題。对于中国原始資本的各种来源，有的說地租轉化占首要地位，其次便是官僚資本、买办資本和商业高利貸資本等^⑤；有的說官僚資本的轉化占首要地位，其次是买办資本和商业、高利貸資本等^⑥；有的甚至說，中国货币資本的主要积累手段，只能是前資本主义的地租、高利貸和商业利潤^⑦。他們將地主的地租剝削、貴族的賞賜和分封、官僚的敲榨勒索、商业高利貸資本的盘剝，大书而特书，究竟这些积累是否轉化为資本却不見交代，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形式的財富积累和資本原始积累的区别。

我們认为，只有遵循着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的科学定义，并对我国最早出現的一批資本主义企业作一番具体分析，看一看它們的資本来源究竟包括那些成分，才有可能比較正确地估計各种来源的地位，以及由此而表現出来的种种特色。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3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1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3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3頁。

⑤ 孔令仁：《試論中国原始資本积累》，《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

⑥ 谷书堂等：《中国原始資本积累問題》第92頁。

⑦ 湖北大学編：《中国近代國民經濟史讲义》第200頁。

(二)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沿着一条很不正常的道路发展的。

正象毛澤东同志所說，“中国封建社会內的商品經濟的发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国資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緩慢地发展到資本主义社会。”“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①

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之后，胁迫中国政府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約，攫取了种种便于他們进行掠夺的特权。他們不仅在中国傾銷商品，搜括原料，而且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經營起近代工业、航运和公用事业。这批企业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化企业。

接着，从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官僚集团創辦軍火工业，这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經營工业的开始。然而，就其生产关系的性质說，这批企业，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封建官府工业的直接继承者，它具有十足的封建性。

以上两类企业，一为外国資本，一为非資本主义企业。因此，它們的資金来源，都不屬中国民族資本原始积累考察的范围。

继軍事工业之后，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由官办軍火工业轉而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經營起采矿、炼铁和紡織等民用工业和輪船、电报等近代交通运输企业。誠然，这类企业仍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色彩，但从它們的主要經營目的和剝削性质——即为市場生产商品并賺取利潤，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看，却已基本上具备資本主义性质。因此，这类企业創辦时的垫支資本的一部分，当屬資本原始积累考察的对象。但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开始，九十年代以后才取得較大发展的、最早的一批民族資本主义工矿企业，才是原始积累問題的主要对象。

輪船招商局是招有商股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先声，适可作为这类企业的典型。

該局是李鴻章于1872年奏請創辦的。招集股本的結果，得到商股銀73万两，又由沪津两海关撥官款190多万两，作为股本，官督商办。

必須指出，推动和支持洋务派官僚李鴻章奏办輪船招商局的幕后势力，乃是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拥有巨資，并对新式企业跃跃欲試的买办。

这可以从李鴻章的《試办招商輪船折》前后时期致朋僚的函稿中得到证实。此折奏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②，而前此十个月，李鴻章在其致曾國藩的磋商創辦輪船局的函稿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20頁。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32頁。

中說：“租賃輪船一節，自是經久推广至計，津关委員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議呈九条，照鈔呈覽。据称合湊本銀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攬，由官稽查，或請撥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緘致上海广建各帮妥議。仲复履任后，就巨商反覆籌計，或有定局，鴻章并囑子敬随时函商仲复，無論何項委員經手，必須各关道就近商办。”^① 同治十二年一月，李鴻章再一次提到“添招閩粵巨商入股”^②。

虽然李鴻章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帮“閩粵巨商”都是买办，但这帮旅沪的閩粵巨商至少可以说多半是买办，这可以由許多事实来证明的。当时人王韜說来沪“粵人……大半在西人处經紀通商事务”^③。再从招商局本身看，从1873年起，长期直接經理这家企业的不是别人，正是经历了多年买办活动的大买办唐廷樞（即唐景星）徐潤（即徐雨之）和郑观应。总办唐廷樞于1863年即为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会办徐潤自1852年即已进入英商宝順洋行，郑观应則长期經理宝順、太古、公正等洋行的生意。而局中股本亦系这些人員經手招集。^④ 实际上，他們既是創辦人，亦是股权握有者。輪船招商局設立前夕，唐廷樞即已“在港集股銀十万元，租两船往来港沪”^⑤。正在此基础上，并通过盛宣怀的保荐，北洋大臣始委派唐总办輪船招商局的。徐潤亦首先附股（輪船招商局），前后計之共有4800股，合計銀48万两。此外，徐潤設法招徠各亲友入股，亦不下五六十万两。^⑥ 郑观应亦为股东^⑦ 而唐廷樞、徐潤以及稍后进入招商局的郑观应等人，恰恰正是在鴉片战争以后最早出現的一批广东籍买办。

輪船招商局的籌資历史表明，名义上由官僚奏請創办的，其实际筹划者和出资人，主要是来自买办。招商局恰恰是中国第一个招有商股的近代企业，这就表明，当中国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首先投資的是买办。

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資本来源，我們选择以上海为主的若干地区（包括无錫、南通），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創辦的一批較大規模的工业为典型，对其主要創辦人出身及其資本关系加以考察。

我們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时期，主要考虑到考察資本的原始积累，应以早期的壘支資本为研究对象，若将時間过于向后推移，势必会同資本主义积累（其来源是剩余价值）相混淆，至少是这种混淆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同时，中国民族資本所創辦的工矿企业，虽然自1873年起便已陸續設立，但七十年代創辦的毕竟为数至少，（仅20个左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4頁。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1頁。

③ 王韜：《瀛壖杂志》卷1，第9頁。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6，第35頁。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編》卷10 船务篇，第35頁，《張君弼士书》。

⑥ 《徐愚斋自叙自讚》。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編》卷10 船务篇，第1頁，《致招商局总办書景星观察书》。

右)。八十年代虽略有增加,又絕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一些規模較大的企业,則几乎完全是1890年以后創办的。自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为中国民族資本的最初发展阶段。因此,我們认为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范围,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

再从地区上看,上海、南通、无錫,虽然只是区区三个地方,但它們在中国民族資本发展史上却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以中国民族工业中进展最速、規模最大的部門——棉紡織业为例,1890年至1913年的二十四年里,上海、南通、无錫这一小区域内的紗錠竟占全国紗錠数的44.8%以上⊖。

自然,一般說来,創办人出身并不能完全說明原始資本的来源的性质。但中国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华資各厂大多数都是独資或合伙經營的,有的虽名为公司,实则未尝公开大量招股,所以主要創办人多半就是主要投資人。因此对于主要創办人出身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反映原始資本各种来源的构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起見,下面按各行业,分別列表加以說明。⊕

(一) 棉紡織业各厂創办人的出身与資本額:

設立年度	工厂名称	主要創办人及其出身	資本額(元)	紗錠(枚)
1890年	上海机器織布局	郑观应(宝順洋行、太古洋行买办) 龔寿图(江苏后补道) 蔡鴻儀(郎中,业宏沪甬) 李培松(道員,盐商) 戴恒(翰林院編修)	699,300	35,000
1894年	上海裕源紗厂	朱鴻度(上海道員)		25,000
1895年	上海裕晋紗厂	中国人与华俄道胜銀行合办;此中国人可能是与道胜銀行有关的买办	279,700	15,700
1895年	上海大純紗厂	盛某(上海富紳)	279,700	20,392
1896年	无錫业勤紗厂	楊宗瀛(长芦盐运史)等	335,700	10,192
1897年	上海永泰紗厂	徐錦荣(出身不明)	279,720	
1898年	上海裕通紗厂	朱幼鴻(又名朱壽,朱鴻度之子,浙江后补道)	209,800	18,200
1899年	南通大生紗厂	張謇(翰林院編修)	699,000	23,000
1905年	无錫振新紡織厂	柴宗敬(錢庄主) 張石君(茂生洋行买办) 柴瑞馨(鴻源紗厂买办) 叶慎斋(怡和洋行买办) 鮑成昌(布号股东) 徐子仪	419,580	10,192
1907年	上海九成紗厂	中国人与日本棉花会社合办;此中国人可能与日本有关的买办	461,500	9,424
1907年	崇明大生紗厂	張謇	1,210,000	26,000
1907年	上海振华紗厂	吳祥林(怡和洋行买办)与怡和洋行大班凱福合办	419,600	11,592
1907年	上海同昌紗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銀行买办)	600,000	11,592
1910年	上海公益紗厂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席立功(汇丰銀行买办)	1,340,000	25,676
			7,233,600	

* 注文見下頁。

从中国最早的一家大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起，至1910年止，上海，南通，无锡三地，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型的棉纺织厂共14家，其中一半是买办创办的或有买办参加投资。已知的23个投资人中，有10个是买办。14家工厂中，资本最雄厚、纱锭最多的，除官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买办创办的，如公益纱厂、同昌纱厂、振华纱厂、九成纱厂等。

(二) 面粉工业各厂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設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898	上海阜丰面粉厂	孙多森(尚书孙家鼐之子, 后补同知)	350,000
1900	上海华兴面粉厂	祝大椿(怡和洋行买办)	400,000
1900	通州大兴面粉厂	張譽(翰林院編修)	20,000
1903	无锡茂新面粉厂	荣宗敬、荣德生(钱庄主)	70,000
		張石君(茂生洋行买办)	
		荣瑞馨(鴻源紗厂买办)	
		祝大椿	
1904	上海裕丰面粉厂	朱斗文(大亚銀行常董)	140,000
1904	上海裕顺面粉厂	朱計	140,000
1905	上海中兴面粉公司	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	350,000
1907	上海立大面粉厂	顾馨一(粮店老板, 买办商人)	280,000
		王一亭(大阪輪船公司、日清汽船公司买办)	280,000
1909	无锡九丰面粉厂	蔡絨三	280,000
1910	上海申大面粉厂	王一亭, 顾馨一, 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280,000
1912	上海大有面粉厂	顾馨一	56,000
1913	上海福新一厂	荣宗敬(钱庄主)	150,000
1913	无锡惠元面粉厂	孙复瑞	150,000
		祝大椿	

统计材料表明，面粉业各厂投资人中，已知其出身者11人，买办7个，官僚2个，钱庄主银号股东2个，三个地区的13家面粉厂中，买办和买办商人创办或参加投资的达7家之多。

又据1910年所作调查^①当时沪地面粉业中，增裕、阜丰、华兴三家规模最大。其中增裕为外资，华资二家大厂中，一为官僚孙多森(即尚书孙家鼐之子)创办之阜丰，一为买办祝大椿创办的华兴。就其创办资本说，华兴则超过阜丰，占第一位。

① 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第44页。

②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7页第9表计算。

③ 根据：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38页，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统计。2.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7页，1936年前上海238家工厂主要创办人出身调查。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3章附录。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等资料综合统计。

以下诸表资料来源均同。

④ 《东方杂志》1910年第9期，第86页，调查篇《上海面粉公司谈》。

此外，关于立大、申大、大有三厂的资本主顾馨一的出身，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当作一般粮店老板处理。对于这类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顾馨一的公开身分虽为粮店老板，但“当时他与日本人方面有了联络，独自经营杂粮”以致“获利颇多”。此外，他还和买办王一亭、虞洽卿等常常往来^①，并与王一亭等多次合伙经营。由此可见，顾馨一的资本积累，很可能并非一般商业积累，而应属于买办类型的。

(三) 榨油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設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897年	上海大德榨油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210,000
1899年	上海同昌榨油厂	朱志尧	130,000
1905年	上海大有机榨油厂	席裕福	
		朱葆三(平和洋行买办)	140,000
1909年	上海立德油厂	刘长蔭(历任各洋行买办經理四十年)	364,000

上海棉子榨油业之首創者大德榨油厂，是官僚盛宣怀指派买办朱志尧經手創办的。朱志尧，浙江奉化人，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充当东方汇理銀行的买办。大德由他經理，他是否亦是股东，現在尙无材料，可資证明。然而根据当时工商界的一般情况推测，朱不可能是一个單純的資方代理人，投有資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大德而外，其余三家油厂均为买办所創設。^②不难看出，在榨油业的原始資本中，从买办财富轉化而来的实占着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比起棉紡織工业和面粉工业，更为分明。

(四) 金属加工工业创办人的出身与资本额：

設立年度	工厂名称	创办人及其出身	资本额(元)
1902年	上海求新机器厂	朱志尧(东方汇理买办)	699,000
1902年	上海大隆机器厂	严裕棠(买办)	100,000 ^③

这一时期，上海大約建有十多家机器厂。^④不过，除上表所列两家以外，其余十来家規模很小，資本額多数都在一万元以下，有的甚至还是手工工場。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微弱和狭小，从它的誕生时期就表現出来。

朱志尧的出身，上面已屡次提到，不再重述。关于大隆机器厂的创办人——严裕

① 山本喜一郎：《中日实业家兴信录》，第853頁。轉見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第958頁。

② 大有榨油厂資本主之一——席裕福，其出身尙屬推测，疑为汇丰銀行买办席裕成（即席立功）之兄弟，据《中日实业家兴信录》日文記載，席立功兄弟三人均为洋行或銀行买办。

③ 大隆机器厂的資本額，据《中华民国实业名鑑》（日文）为十万元。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2輯（下），第920頁，附录二《历年設立的机器工厂名录》。

棠的出身，則尚待考证，有說是铁匠^①，但据《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1959年出版）作者的調查，严的父亲曾任洋行包工头和买办。严裕棠本人也一度在洋行当差。显然，严的家庭成分及本人出身皆屬买办阶级，可无疑。因而大隆的垫支資本显然也是和买办資本分不开的。将严裕棠的出身說成是铁匠，我們认为是不恰当的。

此外，如火柴业也是后来中国民族資本投放較多的一个部門。上海最早的一家大火柴厂——燮昌火柴厂，資本額 200,000 元，創辦于 1890 年。其資本主乃是被当时人称作火柴业鼻祖的叶澄衷。关于叶的出身，有說是学徒^②，有說是商人^③。其实，叶澄衷由一个油房学徒一跃而成为上海的亿万富翁的事例，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买办商人暴发史的典型刻画。^④

上海民族資本投资的几个主要行业中，关于繅絲业，我們知道的更少，似乎也比较特殊。这一时期，繅絲业主要集中在广东順德一地，上海尚屬比較发达。根据材料^⑤，辛亥革命前，上海一地創辦的較大規模的机器繅絲厂近 20 家，然而其中一半工厂的創辦年代不明，絕大多数工厂的創辦人及其出身也尚未查清。已知創辦人出身的仅四家，其中商人一人（即 1881 年黄佐卿創办公和永繅絲厂）；官僚一人（即 1900 年薛南溟創辦永泰裕繅絲厂）；买办二人（即 1893 年瑞記洋行买办吳少卿創辦瑞綸絲厂，1904 年怡和买办祝大椿創辦源昌繅絲厂）。

綜上所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南通、无錫三个地区的棉紡織、面粉、榨油、金屬加工、火柴以及繅絲等六个主要行业中，民族資本創辦的較大規模的企业約 38 家，已初步查明其出身的創辦人或投資人共 42 个。据粗略分类，其中买办和买办商人 26 个，官僚 10 个，錢庄主和一般商人 6 个。很明白，买办占首要地位，官僚占次要地位，旧式錢庄主和商人亦有少部分，唯独地主，則一个也沒有。当然，这不是說中国原始資本来源中，就絕對沒有包括地租的轉化。但必須承认，上海最早創辦的这一批較大規模的企业中，确实很少屬地主投资的，更談不上——象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占首要地位。

持有“地租轉化占首要地位”这一論点的人，其根据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他們举聶緝槻家族为例，說聶緝槻、聶云台父子购买华兴紡織新局股票，租办华兴，以致最后收买复泰的资金，都是种福院的地租剝削的轉化。^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 1890 年

①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1 輯，第 236 頁。

② 陈真等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1 輯，第 250 頁。

③ 汪敬虞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 2 輯（下），第 954 頁。

④ 叶澄衷的发家史見本文第三段。

⑤ 資料来源同上列諸表。

⑥ 《山东大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第 60 頁。

起，聶緝槻連任上海道台五年，1894年交卸滬道時，發現“虧空”80萬兩。這筆錢到那裏去了？這些大官僚當然諱言這是他們貪污中飽所致，然而事實真相却是昭然若揭：一面是所謂的“虧空”，另一面則是聶家私人財產的膨脹。請看下面幾筆帳：（1）1891年購買華興股票，1904年組織復泰公司租辦華興，1905年收買復泰，獨資經營，易名恒豐紗廠；（2）聶交卸滬道時，其妻曾紀芬存折上有8,000余兩存款；（3）聶任滬道後，每月給他的母親張氏月費300兩，張氏回湘後陸續另匯三、四萬兩作造屋之費；（4）自1905年起，又在洞庭湖濱，領垦湖田50,000畝，建立起中國式的封建大莊園——種福垸。不僅如此，甚至後來恒豐紗廠的利潤也源源匯回湖南購買土地。

由此可見，與其說聶家財富積累的變換情況是地租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典型，毋寧說它是官僚資本、工業利潤，倒回農村進行土地投資放棄工業的實例。

不僅聶家這樣，其他地主、官僚走同樣道路者，舉不勝舉。

為什麼是這樣呢？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封建剝削特別殘酷。封建剝削特別殘酷，而土地的購買又極其自由。所以，官僚由做官貪污所得，商人高利貸由欺榨盤剝所得，往往流回農村，作為兼併土地的手段。至於地主，就更不願意將他們的地租收入投入他們一向所不熟悉、所不習慣的工業。在他們看來，經營工業是多麼麻煩，還要蒙受財產不翼而飛的風險，買進土地，坐食地租，是安逸的事情，何況地租又是超過收穫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優厚收入。

由此可見，早期資本主義企業的原始墊支資本中來自地主階級者之所以這樣少，是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相吻合的，並不是什麼反常的現象。這種現象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對地主經濟來說，劇烈的土地兼併和土地集中乃是支配它的法則。這也正是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着顯然的優勢。”^①

至於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創辦人中，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買辦，看一看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的狀況，就不難理解了。

（三）

買辦制度是資本主義掠奪殖民地的產物。日本、印度和南洋各國都存在過這種制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4頁。

度。在中国，买办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开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于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的人民大众。”^①

当资本主义列强处在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利用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所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和搜括原料，并非法地设立银行和经营航运业、加工工业。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当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的对外侵略就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和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正是适应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从此以后，中国除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以外，又成了国际资本的投资场所。

当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方式，还限于推销工业制品，搜括农产原料的时代，他们如果不借助于买办，是完全无力进行掠夺的。当外国资本在中国设银行、开矿山、行轮船、办工厂，进行更直接的掠夺时，同样也少不了买办。据海关册记载：1890—1913年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约由两亿一千多万关两增至九亿七千多万关两，而同时期，中国一切通商口岸的全部外籍商行数最高还不足四千家，各种外籍人员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这么几家外籍商行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洋货在既到通商口岸之后，土货在未到通商口岸之前，自两亿一千多万至九亿七千多万的贸易额全部必须经过买办之手。

买办，这个名称，鸦片战争前虽已存在，但它和近代意义上的买办，是迥然不同的。鸦片战争前，他们是清政府管理来华外商的人员。他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和后来刚好相反，是控制外商，而不是为外商所控制。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无论其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从此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买办，控制买办，买办也就成为外国资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买办以抽取经纪费用为利润，是永远只会盈利不会破产的。经过几十年的生长，买办显然已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财力雄厚的显赫阶级了。

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人人都会观察到的；这个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之雄厚，也是众所公认的。当时人这样说：“沪埠百货闾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②“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9页。

② 王翰：《瀛海杂志》卷1，第8页。

业会之闊紳。”^①絲茶是当时中国出口貿易中两宗主要的商品，像在福州、南台經營絲茶的“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②。但是，由于他們隱蔽身分，耻言买办，諱言他們的生財之道，所以人們很难捉摸其势力，涉及买办的若干統計和記載，也不免是挂一漏万极不完全的。

关于买办的收入，严中平同志根据海关册，曾作过如下估計：“1890—1913年，对外貿易总值共計 12,491,969,000 关两，从低估計經紀費用，以 5 % 計算，二十四年里，全国买办階級共获利潤达六亿二千多万关两之多。”^③实际上，这个数字远不是买办階級所得財富的全部。第一，这个数字仅仅包括二十四年，而买办制度，从其产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第二，这个貿易总值，是指通过海关的所謂合法貿易而言，大批走私並沒有計算在內，也无从計算；第三，那些在中国境內，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就地制造就地銷售的直接投資，也沒有包括进去。如果估計到上述因素，那么买办的积累定是比六亿二千多万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

因此，当中国开始发展大机器工业时，买办投資的大量出現，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买办不独拥有創辦現代工厂企业所必須的大量資金，并且拥有創辦現代工厂所必須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識，以及同洋人外国的种种固有联系。这正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貸者等土财主纵使化費巨金也是无从购买的。因此，当地主、官僚、高利貸者都同样握有巨額貨幣財貴，甚至象地主显然比买办积累更多的情况下，首先投資于近代机器工业，并在投資中占着显著优势的，是买办階級而不是地主或其他階級。

正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办工业必須和洋人洋货发生千絲万縷的联系，买办无疑的也就身价百倍。这从两个方面表現出来。

一方面表现在，买办階級本身，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优先将財富轉化为資本。这可以由买办投資規模之龐大中得到证实。上面提到的那几十个企业創辦人或投資人中，投資規模最大者，恰恰就是两个买办，即祝大椿和朱志尧。祝大椿是怡和洋行和上海电气电車公司的买办，創辦和投資的企业有：上海源昌碾米厂、上海华兴面粉厂、上海源昌纜絲厂、上海龙章造紙厂、上海怡和源机器打包厂、苏州振兴电灯厂、无錫源

① 《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第 27 頁。

② 光緒六年农曆 12 月 11 日《申報》。

③ 严中平：《中国棉紡織史稿》第 155 頁。

康縲絲廠、上海公益紗廠、無錫惠元面粉廠、揚州振揚電燈廠^①。此外，輪船運輸業、上海房地產、榨油業、和中國銀行，都有他的資本^②。朱志堯是東方匯理銀行的買辦，創辦和投資的企业有：上海大德榨油廠、上海同昌榨油廠、上海求新機器廠、上海大達輪船公司、北京薄利呢革廠、上海同昌紗廠、上海申大面粉廠、大通輪船公司^③，以及中西書屋等企业^④。

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買辦又成為辦廠各色人物所共同依靠的勢力。中國民族工業創業史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者，首推棉紡織工業。它的最早的一個大型企业——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設立過程，可以作為上述看法的一個實例。

上海機器織布局最先是有一個姓彭名叫汝崇^⑤的後補道於1878年呈請開設的。1878年10月5日，彭汝崇給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上過一個稟帖^⑥，請求李、沈兩人准他設立上海機器織布局；其後不久，彭又特別到天津去面謁李鴻章，並再上稟帖，說明設廠計劃。彭汝崇的設廠計劃表明，他是懂得不少資本主義新鮮事物的，也說明他和上海的英國商人有着密切的聯繫。他說他購買機器是和“經手并作保”的洋行訂有合同的，當機器在英國製造時，就有“我們在英國的代表派人”去監視製造，以防偷工減料；各套機器都是“最新式、最靈巧、最堅固、最合用的”；又英國工匠五人，負責教習中國工人技藝，訂有合同。關於彭汝崇的出身，我們了解得還不詳細，只知道他1878年1879年先後任四川後補道和湖北後選道。根據彭的稟帖和建廠計劃，嚴中平同志推測“這彭某大約和上海英國商人很有關係，很可能是一個買辦，候補道的頭銜是納捐買來的。”我們認為這個推測是很近情理，可以相信的。至於這個買辦既然已經備足資本，也有機器設備和技師，為何還需兩次上書李鴻章和沈葆楨，再三陳訴“未經皇上恩准，不有官委經理，則盡責無權，盡心無保障”^⑦。我們認為，這只能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誰要創辦工廠，不僅和洋貨洋人必須有關係，和封建政權也不得不有關係。

李鴻章等十分欣賞彭汝崇的建廠計劃，並立即委派代表去經理這個工廠。這個被委派的代表就是名噪一時的洋務通——買辦鄭觀應。經過長期的準備，直至1880年，北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第1091頁。

②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54頁。

③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第1091頁。

④ 同①。

⑤ 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7工藝篇，附錄：《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札文》。

⑥ 彭道籌設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稟帖載於《北華捷報》1879年2月21日，第168—179頁，譯文轉見嚴中平著《中國棉紡織史稿》第98—100頁。

⑦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00頁。

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才上书清政府，提出“試办机器織布局”的主張^①。在同一封奏折里，李鴻章还給織布局委派了六个經理人員，这就是三品銜侯選道鄭觀應、三品銜江苏補用道龔壽圖、翰林院編修戴恒，郎中蔡鴻儀、主事經元善、道員李培松。他們虽然都帶有官銜，但这些官銜多半是捐买的，他們的本来身分是形形色色的，龔乃“八閩股臣”，李“久业盐鹺”、蔡“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鄭、經“久居沪上，熟諳洋务商情”^②。这些人同样都拥有巨額財富，都是机器織布局的投資人。^③然而，被李鴻章委派來經理織布局商务的，既不是現任官僚、世宦家族，也不是盐商大賈，而偏偏又是“久已获得中外各方信任”的洋行买办鄭觀應。

从彭汝崇到鄭觀應，这一設厂經過說明，洋务派大官僚李鴻章奏办上海机器織布局的动議是继輪船招商局之后，又一次起因于买办的推动、支持和实际經理。

至于商人、錢庄主等依靠买办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后来号称为“面粉大王”“紡織大王”的三新集团的荣氏家族，也同样經歷过这条道路。当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广生錢庄和厘金局做官积累起一部分貨幣財富，拟投資新式工业并为此而四处奔走覓求經驗时，回答他們的是“洋人关照，到此为止”“从不允参观”。后来终于通过瑞生洋行的买办，才获得一些比較詳細的情况。^④而三新集团的第一个工业企业——茂新面粉厂的前身保兴自此才获得进行机器生产的可能条件。不仅如此，在資金上，三新集团也未能摆脱买办的滲入。1903年設立的无錫茂新面粉厂的股东包括有：茂生洋行买办張石君、鴻源买办荣瑞馨、怡和买办祝大椿；1905年設立的无錫振新紡織厂的股东中也有买办，即張石君、荣瑞馨和怡和买办叶慎斋。

买办阶级的大财产一夜簇生起来的暴发过程，还可以从买办阶级的个别分子的暴发史中得到生动的写照。

关于买办起家的历史，我們只是对徐潤、鄭觀應、叶澄衷等少数人的事迹知道得比較詳細，因此暫以这几人的历史，当作研究的典型。

徐潤^⑤，广东香山人，因“家甚貧”，其伯叔輩先后都“棄儒賈于沪，为英商必里士所引重，业絲茶，名滿中外”^⑥。徐潤本人，十五岁（1862年）即随其叔父离澳赴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26頁載，此折奏于光緒八年（1882年）；但据《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中所刊徐蔚南著《上海織布局始末》一文里，根据織布局广告等訂正为1880年。

② 光緒六年农历九月十三日（1880年10月16日）《申报》，《书机器織布局章程后》。

③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7工艺篇，第10頁記載：“龔、蔡各认五万，李一万，鄭四万，共二十万”，这里鄭觀應未提到戴，但却短少五万，又据《书机器織布局章程后》一文中說戴亦出五万，疑是《盛世危言》中将戴所出五万遺漏了。

④ 荣德生：《乐农自訂行年紀事》第19頁。

⑤ 有关徐潤事迹均見《徐愚斋自叙年譜》。

⑥ 其叔父乃大鴉片商宝順洋行（即順地洋行）的买办。

沪。不久，亦“棄書入賈”，進寶順洋行當學徒。在這裡有一點特別值得指出，寶順洋行就是英商的“Dent & co”，寶順和怡和洋行乃是當時最大的兩家鴉片公司，後來投資新式企業的許多買辦都和這兩家公司有關係，例如唐廷樞、祝大椿、吳祥林等都是出身怡和；徐潤、鄭觀應出身寶順。這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在整個十九世紀，進口貨最大宗的是鴉片和棉製品，在七十年代以前，鴉片地位尤高。在當時也只有鴉片這一行最能賺大錢，棉製品還在可賺可賠之間，絲茶出口在七十年代前還可以，七十年代起就走下坡路了。由此可以推測，早期的一批買辦的發家之快，是和他們干鴉片勾當分不開的。中國資本原始積累和鴉片“貿易”的聯繫，同販賣黑奴又有什麼差別呢？這就突出地表明中國民族資本原始積累的暴力掠奪的本質。

徐潤“兢兢二十年所經理”的事業，也就是這些“富甲于王侯”^①的洋行的事業。

徐潤剛進洋行時，月薪不過10元，但由於“經理”這家洋行生意的結果，早在1859年，便開始有了“積蓄”，並“與曾寄圃師、芸軒兄三人合開紹祥字號，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

1861年即躍居副買辦的職位。“總行中華人頭目”，獨攬行中一切事務。每月收入僅薪水就“400另貼80兩”，其它各項佣金更是無法計算。其積累之迅速，可由他所設商號之多中得到證明。他先後設立有：潤立生、福德泉、永茂合祥記、寶源絲茶土號，順興、川漢等行棧以及錢莊、綢莊、布號數處。經營的貨品，正是各洋行出口的農產、土特產，其中以茶、絲、煙葉、皮油、白蠟、黃白麻、各種桐油為大宗。直至1868年以前，徐氏主要是充當買辦職務，同時又分身經營買辦商業。他一面以買辦商人的身分出賣農產品和農產原料給洋行，通過賤買貴賣的手段獲取商業利潤；一面又以買辦身分來媒介這批生意並從中獲取“手續費”。

1868年，徐潤正式離開寶順洋行，自立寶順祥茶棧。這標誌著徐潤積累的進一步擴大。然而他致富的途徑並未改變，仍舊依附於帝國主義，並從帝國主義掠奪中分取一部分贓物。

1873年，他以積累的一部分，投資於中國最早出現的一個較大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式交通運輸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又陸續投資於礦業、棉紡織、繅絲、造紙、垦牧以及保險和房地產事業。其投資規模之大，插足行業之廣，恐怕也是當時沪地巨室中名矛前列的人物。據他自己在《自叙年譜》中說：“所置之業，造房收租中外市房五千八百八十八間，月收二萬余金（本系撥作寶源祥房產公司）另置地三千余畝，和字號、當舖附股者八家。商局（輪船招商局）股四十八萬，開平（煤礦）股十五萬，

① 王韜：《菉園文集外編》卷4，第92頁，中華書局版。

仁和（水險公司）十萬，濟和（水火險公司）五萬，貴池（煤礦）十萬，三山銀礦六萬，平原銅礦六萬，金州（煤礦）五萬，纜絲二萬五千，織布五萬，塘沽耕局三萬，造紙局二萬，玻璃公司三萬，香港利遠糖局三萬，牛奶公司三萬，宜昌鶴峰州銅礦一萬，統計不下百二三十萬，另搭錢莊股本并外國股分不計數。”此外如同文書局（影印古版書籍）等企業尚未列入。

誠然，徐氏的投資，除礦業外，較大的去向是房地產。不過這也是出自他的洋人上司——寶順洋行的大班韋伯氏的指示。他自己說：“韋伯氏同治二年職滿回國，臨別贈言，與新大班希里甸同一宗旨，均謂上海市面此後必大，如揚子江路至十六鋪地場最妙。此外則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門，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儘可有一文置一文”。而徐潤正是按照他的洋上司之囑，所置房屋遍布外灘四馬路直至十六鋪一帶。

如果再看一看徐潤這一數十口之家的豪華奢侈的生活方式，就更能說明買辦階級之富有程度。1905年一西方女記者，曾對徐氏家族的生活方式，作過一番描述^①根據這個描述，其住宅、設備之富麗堂皇，恐怕也不遜於當時的皇室貴族，就連這位資產階級女士也感到“入其室一若別有天地，恍惚在夢之中。”他說“經往通屋看過，房間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內何處”，“與所聞東方人家大相懸殊”，他說他們西方資產階級也“不能日日得有此”享受。她還說徐“五公子現在岳士佛學習政治法律科”，“四公子曾往美國遊學”，“女公子與媳婦”對於英語“均能娓娓應對”，“且絕無半點可厭之洋涇浜英語”，“四位小孫亦學習英華文字，謂俟其長成，擬送英國讀書”。不難看出徐氏一家生活方式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是多麼濃厚、多麼明顯。這一切堂皇裝飾和洋化生活，不正是徐潤多年來從事買辦和買辦商業活動的結果嗎？

鄭觀應，廣東香山人，大約出身於一個相當大的地主家庭。十七歲（1858年）^②即離鄉赴滬，并“棄舉事，學西人語言文字，隱於商了”^③據1892年他自己所說，他“總理寶順及太古輪船公司事務，嗣又與洋人創辦公正輪船公司及各國攬載行”凡“三十餘載”^④。這就是說，充當了三十多年買辦和買辦商人。寶順洋行毋須再作介紹，英商太古輪船公司，乃是繼美資旗昌之後，創辦於1867年，在旗昌被中國輪船招商局收買之後，它和英商怡和輪船公司，成為霸占中國沿海沿江航運的兩個最大壟斷組織。鄭觀應長久地經理這兩家洋行生意，從中賺得了相當雄厚的資財，并因此同外國商人建

① 見《徐愚齋自叙年譜》第115頁附錄。

② 據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8商務篇，第43頁，15卷雜著篇，第49頁，鄭觀應自叙履歷推算所得。

③ 鄭觀應：《盛世危言》彭玉璽序。

④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商務篇，附錄：《論招商局及肇興公司事略》。

立了多种联系。凭着拥有巨额资财，他在1869年、1870年、1878年先后三次捐买官衔，由员外郎而郎中。尽管官衔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官职，但这足以表示买办和封建统治政权的联系。郑观应正是凭借这些资财和买办出身而身价百倍的。1869年后成为当时封建统治头目里热中洋务的人争相罗致的红人，和各地近代工矿企业创办者争相握色的股东对象。郑观应总计先后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左宗棠，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兵部尚书彭玉麟等经办过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粤沪电线、上海汉口电线、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铁路公司、江西萍乡和安徽宣城煤矿、吉林三姓矿务局、粤汉铁路。^①他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已知的有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②、开平矿务局、福建南太武山煤矿^③、锦州煤矿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平泉金矿公司、建平金矿公司、玻璃公司、同文书局、上海牛奶公司^④等。

必须补充说明一个事实，即上面所指买办，特指那些投身洋行，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豢养，直接从外国资本的商行、银行、轮船公司、工业企业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中，分取一杯残羹剩饭的具有正式买办身分的人而言。此外，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的扩大，一个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搜刮农产品服务的买办商业剥削网，星罗棋布于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

帝国主义倾销到中国的货品，从衣食到零星杂物，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庞大的销售机构，但这些商品主要还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买办体系经过中国商人而倾销到全国或贩运出口的。例如为了推销外国进口的洋货呢羽等商品，还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广州就有不少商人“唯利是图”，一时“开设洋货店者，纷纷不绝”，仅在回文街等处即达二百余家之多。^⑤又如厦门，在1848年开埠后不到一年中，即有何厝乡、卓崎等地商人，争附洋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国商人买卖，并勾串走私。^⑥其他各地“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资财者，不一而足”^⑦。

这些商人，也是在外资的孵育之下而暴发起来的，他们剥削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辗转贩卖外国商品而从中间牟利。虽则名义上不是买办，实质上却与买办无异。不难看出，这类资本主，其资本来源和买办的资本来源出于同源。上面提到的叶澄衷，就是这类

① 吳尹全撰：《侍蘭山人事略》，轉見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第969頁。

②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7工藝篇，第10頁。

③ 1898年10月10日《中外日報》。

④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0船務篇，第119頁。

⑤ 《道光23年廣東探報》。轉見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4冊，第296頁。

⑥ 《清代鈔檔》道光29年農曆3月初8，《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轉見《歷史研究》第六期，第55頁。

⑦ 《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第22頁。

人物的典型。

《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記述叶澄衷的事迹如下：“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谿县，后迁鎮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毗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贈荣祿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撫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給。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貧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資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1853年至上海，“經人介绍入法租界某杂货商店为店員”，不久即辞去。“至时海禁大开，帆船輪船，麇集于沪濱。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質有无。外人見其誠篤敦謹，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1862年）始設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同年又迁至苏州河畔的上海的“百老汇”区，“初，肆規甚微，数年間，肆业日益扩大，乃推广分肆，殆偏通商各埠”^①。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开始投資新式工业。最早是继商人黄佐卿创办上海第一家机器繅絲厂之后，在閘北创办綸华絲厂^②；1890年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該厂資本200,000元，工人1080个），此乃当时沪地最大之火柴厂^③；1896年投資中国第一家近代銀行——中国通商銀行^④；1897年投資汉口燮昌火柴厂，为該厂最大股东^⑤；1898年投資徐杰淦創办的福建南太武山煤矿，資本五万元^⑥。

1899年他死去的那一年，有人估計其家資达到八百万两^⑦之多。不能說不富有了。

上述事实表明，叶澄衷虽然于早年曾一度“佣于邻里”和充当“杂货店店員”。然而他并非学徒出身，他在投資工业之前，其主要经历乃是由一个掉一扁舟与外国船只进行买卖的小洋貨販发展成一个設肆于各通商大埠的巨商，并由这些活动中賺得了相当雄厚的資財，从而投資于工业的。由此可见，叶澄衷投資工业的資金，无疑地是来源于經營买办商业所賺得之商业利潤。

当时人说买办“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徐潤、郑观应、叶澄衷等人的发家史表明这一結論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而早期工业資本中来源于买办者又那样多，就更加证实这一結論是带有級大普遍性的。

① 《叶君傳》，載于《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第22頁。

② 《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載門第14頁載，綸华絲厂是继黄佐卿在1831年所創办的公和永繅絲厂之后設立的，故推側为八十年代。

③ 孙毓棠編：《中国近代工业史資料》第1輯下，第993頁。

④ 《上海研究資料》第268—269頁。

⑤ 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10期，1914年10月。

⑥ 1898年10月10日《中外日报》。

⑦ 1899年9月4日《中外日报》。

馬克思說：“工業資本家，不象租地農業家那樣依漸次的方法發生的。”^①在中國，以買辦為代表的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正是這樣，其積累是異常迅速的。如果說在英國，是因為十五世紀末葉各種大發現所造出的新世界市場的商业要求，那末在中國，則因為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会經濟的猛烈破壞，刺激和促進了中國原始資本跳躍式地積累起來。一句話，外國資本侵入中國的过程，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也就是中國民族資本原始積累的过程。

(四)

在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最早出現的一批較具規模的資本主義企業中，可以說十之八九為買辦所創建或是買辦參加投資的。這充分表明買辦手中積累的財富，在中國原始資本形成中是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這樣說，是否會導致“中國資本主義的買辦性十分強烈，不可能有民族性”的結論呢？我們的答复是否定的。因為，說資本家出身於買辦同後來發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象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之間；或者說，買辦用來創辦新式工礦企業的財富同現在大家所熟悉的官僚買辦資本之間是兩個迥然不同的范疇，不能等同看待。

后者，官僚買辦資本或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其階級實質正如毛主席所說：“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這個階級“和地主階級一起，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國生产力的發展”，“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②。官僚買辦資本，从生产方式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类型，它本身代表着一種剝削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它的典型形态則是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買辦資本。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一種壟斷資本，“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旧式富农密切結合着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③。正因為是這樣的一種買辦資本，它才成為中國革命的对象。

至於前者，是說明企業投資人出身於買辦階級，或者說墊支資本來源於買辦的積累。這裡涉及的是資本主義生产方式出发点中的問題，而不是資本主義生产方式本身。和商业資本、高利貸資本一樣，這種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它的生产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47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3頁。

方式”^①。买办的剝削方式，十分类似牙行的剝削方式，同是一种居于买卖之間的中間人。在封建割据的社会經濟条件下，牙行依仗封建統治势力，借助于处在买卖之間の壟断地位，进行超經濟榨取。买办則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經濟条件下，依仗着外国資本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并借助于自己处在中外势力之間の壟断地位，以抽出經濟費用的形式，进行超經濟榨取。这是一种让渡利潤，其最終結果，乃是轉嫁至劳动农民、小生产者头上，剝削他們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

从积累的手段来看，买办是充当着外国侵略者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导管，和其它国家的資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一样，也是“由征服、压迫，劫掠、杀戮，簡言之，由暴力起重大的作用”^②。只不过各国行使暴力的形式不一样罢了。对于资产阶级來說，不論是哪一种阶级出身，其历史都是掠夺的暴发史。对于劳动者來說，無論是哪一个国家，資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就是本身被掠夺的历史。因此，那种把中国民族資本原始积累的特点說成只有被人掠夺而沒有掠夺的論点，是十分不妥当的。

从积累的用途来看，买办积累的資金确有不少是投入了在华的外資工厂企业，扩大了外国侵略者的实力，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也有不少轉化为土地投資，进行封建剝削，这些，都是买办阻碍社会經濟发展破坏性的一面。

此外，买办积累的財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向——即作为垫支資本来經營新式工矿企业，独立地发展本国經濟。这时候，他就由本来的买办身分轉变为另一种身分——民族资产阶级，并必然和他原来的买办身分相矛盾。

帝国主义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給地，变成制造品推銷場所当中，連帶把新的劳动手段，新的資本主义經營企业的方法輸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誘导作用；可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从而，中国本国資本主义經濟的独立发展，就是意味着它們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場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們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們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輸出商品，更需要輸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因此，对中国民族資本的发展，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撓。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輪船招商局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輪船招商局創立后，太古、旗昌、怡和，就与它展开了剧烈的竞争活动，曾几次連續跌落运价，企图扼杀招商局。所以說，尽管这些人出身于买办阶级，当他們一旦轉化为民族資本后，同他們所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776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02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22頁。

依附的外國資本主義，在經濟利益上，又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矛盾。這是事態發展的必然趨勢，不是買辦分子的主觀願望所能左右的。

矛盾，這只是買辦轉化的民族資本與外國侵略勢力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方面。對於買辦來說，和外國資本有矛盾，這是有一定限度，到一定時候，就會適可而止的。

依賴，則是他們相互關係中的不可分割的另一個方面。本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誰要建立近代化企業，就勢必要和洋人洋貨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對於來自買辦的民族資本來說，這種依賴關係，就更加突出，更加明顯。這不僅表現在它們所使用的機器設備，主要原材料及技術人員方面，不得不依賴外國資本。尤其因為他們和外國資本之間，本來就有着更多的聯繫，因此一旦發生困難時，買辦比起其餘民族資本，就會更為急速，更為徹底地下降為外國壟斷資本勢力的附庸。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二十世紀初棉紡織業早衰的情況，就是明顯的證明。例如與道勝銀行有關的某中國人，於1895年創辦了上海裕晉紗廠，到1901年因積欠道勝銀行透支款380,000兩被迫拍賣給日商；又如1907年創辦的上海九成紗廠，初為華人某與日本棉花會社合資創辦，開業不久，即被日商吞併過去，改名日信；再如，怡和洋行買辦祝大椿，1910年創辦上海公益紗廠，後為利用怡和洋行以推廣銷路，乃讓一部分股份與怡和成為中英合資，民國後，竟全歸英商。此外，假借外資名義、掛洋牌、掛外國旗子、或將資本投向外國工廠的事例就更為普遍。

由此可見，民族資本，縱使是來源於買辦者，跟外國資本之間，同樣是有矛盾鬥爭和依賴妥協的兩重關係。

毛澤東同志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繫，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①

• 買辦階級出身的民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這種兩重關係，正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兩重性的經濟根源之一。

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4—635頁。